

《梁英明印尼生活回忆》之七

的师生。

1950年起,巴中毕业生留校任教人数逐年增多。在学生眼中,留校的青年教师原来就是高班同学,师生年龄相近,相处比较融洽,因此教学效果比较好。青年教师在课后常常参加同学的文艺体育活动,成为学校开展文艺体育活动的重要力量。其中,物理课教师潘志强、林耀解是巴中篮球队的主力,李伯巧老师和我也常,在课后与同学们打羽毛球。巴中青年教师组成的舞蹈队则曾多次参加雅加达华侨庆祝国庆等活动。

巴中新校舍

巴城中学是二战后才创立的一所新学校。建校初期,巴中连校舍都没有建成,只能借用广仁学校和华侨公学的教室上课。比起二战前创立的八华中学和中华中学等老华校,巴中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只有依靠全体董事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以及华社各界热心人士的积极支持和赞助,巴中才有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雅加达乃至印度尼西亚的一所著名华校。

1947年,我就是巴中借用的宛朗岸(Blandongan)旧校舍开始上第一课的。后来,巴中在芒加勿刹(Mangga Besar)街开始修建新的校舍。我升入高三时才转到新校舍上课。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巴中每年只能修建一部分教室。初中部仍留在宛朗岸。1950年我开始在巴中任教时,还是要回到宛朗岸旧校舍上课。后来,巴中招收的新生人数急剧增加,教室不足的矛盾就愈发突出。为了满足上课的需要,学校不得不在篮球场旁边搭建了一排简陋的教室。这些教室不仅面积狭小,而且只有靠外侧修建了砖墙,靠里面的一侧却没有任何墙体,以致在下大雨的时候,雨点就会洒到坐在靠边座位的同学身上。

为了筹集建校资金,

1952年在各班学生中开展了一场“献砖运动”,即发动同学家长捐助建校经费。捐款金额以砖为单位,因此称为“献砖运动”。周末的最后一堂课,各班在班主任主持下由学生分别自报家长献砖的数量,并开展竞赛。开始,学生往往少报献砖数,然后相互挑战,不断增加献砖数量,直到全班在欢呼声中胜利结束。我认为,当年的“献砖运动”一方面体现了华侨社会热心支持教育事业的传统精神,但在另一方面,捐献本应该以自愿为原则,而且必须量力而行,不应勉强。为鼓励家长捐献而在学生间采取竞赛的方式,无疑给一些家境困难的同学增加压力,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

我和黄天美毕业任教时,都在校外租房子居住。我们每日除上课外,还要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住地离学校比较远,工作自然受到影响。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工委李梅老师的家在巴中附近,她了解我们的困难,慨然让我和黄天美在她家暂住。这对巴中和我们来说,无疑是十分及时的帮助,我至今铭感在心。在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中,来自雅加达以外地区的越来越多,在雅加达又没有住家。于是,巴中在新校舍内修建了四个房间的教师宿舍,我们八位青年教师便得以集中住在校内,直到1955年我和黄天美、潘志强同船回国,才告别了这个值得怀念的教师宿舍

《中学生月刊》

1946年初,雅加达巴城中学、中华中学和八华中学联合成立中学生联合会,并在中华中学张国基老师的倡导和支持下出版《学联会月刊》。由于刊物内容过于激进,在学联会理事中引起争议,月刊只出版两期即宣告停刊。1947年初,一部分同学又成立一个新的团体,称为中学生社,并出版《中学生月刊》,由杨维灿任社长,李尊贤任编辑,陈

长淦任财政兼发行工作。聘请华中张国基老师和新中华中学校长杨新容老师及《新报》记者温德玄(慕由)先生为顾问,并请张国基老师题写刊名。

不久,杨维灿等主要创办人相继去香港达德学院学习,游禄中(胡月)继任总编辑。后来,任觉(华中同学)和我加入编辑部。《中学生月刊》创办初期,人员很少,经费困难,编辑部约稿、写稿、改稿和排版工作,都没有任何报酬或稿费。幸亏得到一些爱国华侨和《新报》的帮助,才得以按期出版。尽管如此,游禄中先生有时还需垫付一些费用,以解燃眉之急。《中学生月刊》设有笔谈、印尼史话、自然科学、青年习作以及木刻漫画等多个栏目,它虽以华校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但同时也受到许多爱国华侨青年职工的欢迎。作者队伍也逐渐扩大,如巴中教师李伟康(阿五)先生、《新报》的温德玄(慕由)先生和《生活报》的杨化先生,都是《中学生月刊》的热心作者。1950年后,刊物销量迅速扩大,读者遍及印度尼西亚各大城市,各地均有代理处。

《中学生月刊》的工作都是义务的,编辑部成员也常有增减。巴中教师曹辉贤(李宿)、林家骏和华中教师蔡仁龙等均曾担任编辑工作。1952年,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局的变化,游禄中先生举家归国,由我接任总编辑工作。1955年我回国升学后,《中学生月刊》由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文教部接办,新华学校甘甲松老师任总编辑,邹访今先生等任编辑。1958年停刊。

《生活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雅加达早已有两家著名的华文日报,就是《新报》和《天声日报》,它们在日本占领时期都被当局取缔,直到战后才得以复刊。《新报》一贯秉持民族主义

立场,同情和支持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最受华侨读者欢迎,也得到印度尼西亚各界人士的尊重。《天声日报》则是中国国民党人创办的报纸。我在梭罗华侨公学读书时,已是《新报》的忠实读者,在巴中学习期间开始接触《生活报》,并逐渐成为它的热心读者。中国内战爆发后,《生活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尖锐的批判精神,激起广大爱国华侨青年的共鸣。它对中国国内新闻和世界形势的报道十分详细,分析深刻,论点精辟,文字也很流畅,这在当时雅加达的华文报刊中是很突出的。

特别令我敬佩的是《生活报》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生活报》迁到新址后距离巴中新校的校舍不远。我在课后曾多次去报社“探访”。虽说它是报社的新居,但依然是一座普通的房子。雅加达的气候炎热潮湿,《生活报》的编辑和记者在拥挤的房间里,一面在撰写和修改稿子,一面要不断地擦拭脸上的汗水。排印车间的手民则要整天站着从铅字架上拣出一个个铅字来。报社的广告收入不多,经费困难,因此工作人员每日辛勤工作,也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可以说,他们都是在为华侨的爱国事业而不计报酬地默默耕耘。

1949年,我开始给《生活报》副刊撰写一些杂文、随笔和评论性文章,开始仍署名“晨旭”,后来经常使用的笔名是“萧明”。现在重读当年我在《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个爱国热血青年一心向往革命理想的情怀。今天看来,这些习作显得那么天真,那么幼稚,却又是那么真实,那么真诚。它们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也清晰地映照出我成长的足迹。它们是我的青春的一部分,因此是值得珍惜的。

《生活报》主编郑楚耘老师于50年代初期曾到巴中兼任国文课教师。那

时我已经高中毕业,留校任教,因此没有机会在课堂上聆听郑楚耘老师讲课了。但在果余时间里,我还是常常有幸在教师休息室里听到郑老师和钟士民老师、刘纯煜老师等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精辟评论,深受启发。

1952年,雅加达又出现一份华文报,称为《正论星期刊》,每周出版一期,由《新报》编辑陈寒冰先生任主编。该报主要刊登有关当地华侨工商业的新闻,以及印尼政府公布的有关法令条例,同时每期刊登一篇国际时事评论。当时,陈寒冰先生在巴中兼课。经钟士民老师推荐,陈寒冰先生邀请我负责每周撰写一篇时事评论。由于该报处在初创阶段,只能靠少量广告勉强维持,因此没有能力向我支付任何稿酬。

工作方针转变

1951年起,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形势出现一些变化。当年8月起,印度尼西亚各地相继发生逮捕印尼政界某些左派人士和爱国华侨的事件。到8月16日,进一步在雅加达对印尼左派人士以及爱国华侨社团和华文学校主要领导人实施大逮捕行动。这就是所谓“八月大逮捕”事件。被捕者包括《生活报》负责人黄周规、郑楚耘、杨新容、汪大均、翁福林等,《新报》负责人洪渊源、谢佐舜等,以及华中张国基老师等。印度尼西亚当局一直没有公布逮捕行动的理由以及被捕者的人数,也没有依法进行公开审判。几个月后,被捕的爱国华侨陆续被释放。这一事件显然是印尼政坛右翼势力发出的一个信号。此后,当局不断发布限制华侨爱国活动的措施,我们的处境日益困难。

1952年后,为了适应新形势,不得不改变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开始分为两条线开展工作。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各个爱国社团的领导